

初阳晴好，天是蓝湛湛的空明，时有微风微微飘过。廿五度左右的气温，很是舒适。上午时分，隐隐有细微的声音在空气里飘浮，游丝般若有若无。是弄曲，不甚分明，却又分明。凝一下神，声音来自阳台方向，便起身至阳台。是一管竹笛，吹着《斯卡布罗集市》。阳台外没有人家，应该是马路对面的，山坡上。吹奏技巧并不高明，或者说，没有技巧，一曲下来不间断而已。但反复循环，周而复始，他吹了近一个时辰，我也躺在藤椅上听了近一个时辰，直到子午线划过。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？请代我问候一位姑娘。

有人说人有通感，我感觉这管笛子吹的是视觉的，一个男人的背影——通常吹奏乐多是男人，大概女人气息量不太够——手持一柄短笛，中年向老的身体有些前倾，慢慢走上山坡，去在开阔处，

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？

叶子

举起笛子来，是普通的竹笛，随便吹，没想过是不是打扰别人——上山也是为无可打扰吧？也没想过好听不好听，是自在的状态，没心没肺。他吹得没心没肺，我却听得入心入肺。好东西都是无心的。有一心，就着了痕迹。为什么是山坡上呢？因为声音是向各个方向均匀传播的，没有定向，就是没有阻隔。墙，楼，都是阻隔。

他为什么吹这支曲呢？这支悲伤的曲子。我要走了，不再回来，我爱的一切，连同爱本身，离开是注定的，我唯一想做的事，也能做的，是留下我的爱，和留恋。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我留下了，这才是根本。没有之一，唯有唯一。悲伤是因为离开。如果小

伙子不上前线，他不会请人代向姑娘问候，要么自己回去找到姑娘，要么不思蜀也就不问候了。如果他去的不是前线，到时候会回来，那么他也无需找人代向姑娘问候，等自己回来就好。但他去的是前线。他离开了，不再回来。其实无形的前线刻刻都是，在在都是。只有你明白了，这是离开了，

爱 and 留恋，才会真切。你不会再有了，因为你离开了。你不会再有了，所以留恋了。我们终于懂得了爱，是因为我们懂得了离开。离开的时候，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守护所爱，也为所爱守护。朝朝暮暮。时时处处。古人写诗词说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是不晓事的疯话，如何

信得。或者是晓事的假话，如何听得。没有了朝朝暮暮，又何来久长？离开了，才知道不再是如何痛楚，也知道不再是在注定，于是，悲伤成了存在，而歌曲得以永恒。

《红楼梦》里过中秋节，老太太说，如此好月，不可不闻笛。音乐多了，反失雅致，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，就够了。老太太说，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听。

一部红楼，我最爱老太太，她的鉴赏水平，她的超然姿态，让我等不及地也要快快老去。丝不如竹，是竹能响亮，古人谓之裂帛，然而也因为此一裂，必有惊心动魄，还因为这一裂，必然底下有无尽的悉索嘈杂泛起，会觉得聒噪，所以笛子须得“远远地吹起来”，而且“越慢越好听”。

悠扬是有距离的，如同悲伤，也是有距离的。空间，时间。事近身必然急切，痛切肤肯定惶楚，那都



不是悲伤。当急切沉静下来，痛楚平定下去，悲伤才会来。当悲伤来时，一切都会退去，天，地，人，物，都回归到初始，简单而纯粹。这时，你听到了悠扬。它是悲伤的最贴切表达。

我不知道吹笛人是否悲伤。他选择了这支曲，这本身已经是说明了。他吹得并不悲伤，这本身也已经说明了。

悲伤是平静的，从不嚎啕，絮叨，连呢喃也没有。因为悲伤洗净了我，也洗净了物我之分，只是个存在，与天地一样悠扬。

《一棵树旅舍》收进去的九篇中短篇小说，都是我近几年里完成的作品。实在是不多的。

从 2011 年开始，我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，细细算来，计有《客过亭》《安江事件》《问世间情》《圆圆魂》《古今海龙屯》《上海·恋》和《五姐妹》七部。中短篇小说，我大都是在写作长篇小说之后，阅读和思考的间隙写下的。可能是写得较少的缘故，中篇小说发表以后，分别给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转载过。

《老年“艳遇”》那一篇，说是短篇小说，都有点勉强，只能归入现今势头颇旺的微型小说类了。但那是我的多年的一位朋友身上前几年刚发生的一件事儿。我只是做了一点儿创作上的处理。小说发表在老年报上，我的这位朋友看到了，我害怕他会对我有意见，结果他遇见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，握着我的手，使劲地摇着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我心里明白，他不会对我有微词了。

我想说一说是《大山洞老刘》这个短篇。小说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以后，没啥大的影响。除了个别名作家遇到我，说这种形式“有点意思”“很有意思”之外，再没其他人和我提起，我是有点失望和失落感的。

写了一辈子的小说，我心中总有个念头，觉得小说写到当今，该有一种新的形式了，来冲击一下。恰好我们手机上的微信群里，经常会因某一位人物，某一件事，引起不少人针对这一人物和事件，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。各人纷纷扬扬发表出来的观点、看法、意见、猜测、赞赏，甚至抨击，往往鲜明地体现着这个人的性格。我想，这不是也可以引发和启示我们用这一形式写成一篇小说呢？于是选择了几个素材，写了几篇小说。《大山洞老刘》这一篇，我也将其编进了这本集子，以希望引起感兴趣的人们关注。

而另外七篇或长或短些的中篇，其实也同我当时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有某些关联，比如《美丽家园》几乎是和《老年“艳遇”》同时期写下的；而《明达的婚事》则是写完《安江事件》之后几天完成的……

趁着汇集成《一棵树旅舍》的机会，写下这几句补白式的文字。

（《叶辛自选集：一棵树旅舍》自序）

琢磨短篇小说的新形式

叶辛

朋友移居美国后，受邀参加一对朋友的婚礼。到了赠礼环节，有人拿出一本书，有人献上一帧放大的照片，有人送出一个领夹。这位朋友如坐针毡，别人准备的礼物，要么有纪念意义，要么有共同的故事与回忆，而她只是准备了一个 1000 美元的红包——直到席散，她也没好意思把红包掏出来。

送礼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有一年，我参加某学习班结业，班干部提议，全体学员送件礼物给学校留念。送什么好呢？班干部们开了几次会，依然定不下来，有一次还因意见相左，几位争了个面红耳赤。我看不下去，站出来说，礼物只是表表心意而已，送黄金珠宝或一块石头，一幅墨宝或一盆花，都是好的。只要心意是真的，就好。送什么并不重要，送不送也不重要。既不须求它久远，也不必赋予它过重的意义。什么东西可久远？什么东西有意义？意义在于物件之外，流传也在物件之外。

我慷慨陈词一番，即有同学们附议，说我讲得对。后来过去多年，有一次吃饭，一位同学提及此事，对我哈哈一笑，说道理谁不懂，送什么礼物确实不重要，那么重要的是什么——听谁的意见才重要。我拍拍脑袋，这才明白过来。

柔情的多瑙河从匈牙利首都流淌而过，把一市两城——布达和佩斯轻轻分拨。

我信步左岸佩斯河畔，耳边回旋着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《蓝色多瑙河》轻松愉悦、抒情明朗的旋律，不远处雄伟华丽的国会大厦似在招手迎候，然而沿岸一溜不规则排开的鞋子下桩股令我驻足。男鞋、女鞋、童鞋，尖头的、圆头的、高跟的、高帮的、船式的、系带的，细数一共 60 双；虽为金属所制，却是十分逼真；鞋旁有的供着花串，有的祭着饮品……哦，这就是著名的“鞋子纪念碑”，建于 2004 年，为的是纪念 60 年前德国法西斯枪逼数千民众，让

大疫当前，总希望能做点什么，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。除了捐款捐物、坚守岗位，做一名志愿者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机会来了，本市唯一的口罩生产厂家招募志愿者，得到消息后，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了 20 多位同志参与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原来这是一家专业生产 N95、PM2.5 和普通医学口罩的医疗企业，正当非常时期，省市相关部门多次到公司调研情况，指导政策，一方面要扩大再生产，另一方面材料紧缺，尤其是大部分工人仍未返岗，亟待人力支援，所以市里一发倡议，立即得到了包括本单位在内的社会各界积极响应。

他们脱下值钱的皮鞋，脱身多瑙河的惨剧！铭记历史，教育后人，此举当赞。

我低首观鞋，感心缓行，倏见近前一位年轻女士坐在河边，神情悲哀地凝视着一双皮鞋，一朵白色小花置于鞋上，伤心故事不言自明。我不能再贴河边走了，停步，持相机聚焦其脸按下快门；稍平气，蹑手蹑脚远她而过。这时，泰戈尔的诗萦绕着我：“眼睛为他下着雨，心却为他撑着伞。”

此景此情，去岁之事，时有念及，挥之不去。抗疫宅家，翻照再顾，幸亏她戴着墨镜，否则我真不敢正视……

鞋子纪念碑

吴道富



摄影

但做小小“一朵红”

张凌云

我们从事的只是一些后道加工程序，钉耳带、贴鼻条、装袋、塑封……任务不算复杂，重要的是认真细致。每个人戴好口罩头套手套等防护用具，围着几张硕大的工作台，从完全生涩的新手到半熟练的“装配工”，大家你追我赶，展开了一场火热的劳动竞赛。

钉耳带就是将口罩片上两根绕在耳朵上的松紧带钉牢。这道工序最为简单，有专门的耳带口罩机，耳带被嵌于相应位置，只需操作员将口罩片放到传送带上，钉耳带由机器自

记得曾经与郝明鉴先生一起聊过电视台“嘎讪胡”这档节目。他侃侃而谈“嘎三胡”……

北方人叫“砍大山”，四川人称“摆龙门阵”，浙江人叫“谈山海经”。这几个词语，北方人、四川人和浙江人都有明确的说法和写法，唯独上海人的“嘎三胡”，嘎了这么多年，仍不知道如何写法，我们知道的有几种写法。

“三胡”的“三胡”，到底是哪两个字？写法不一样，说法也不一样，有人把它写成一二三的“三”，胡说八道的“胡”，“三胡”。据说是从民乐二胡来的，二胡是不好学的，一年笛子，两年箫，二胡拉断腰。因为不好学，七拉八拉，有人称它是“嘎二胡”，随便乱拉拉的，声音不好听，我们就把这种没有主题的闲聊，扯到哪里算哪里，就好像是拉二胡一样的。二胡不好拉，仿照“三胡”就更加不好拉，凡是七搭八搭乱讲，大家很随意聊天，就把它称为“嘎三胡”，这是一种说法。

第二种写法是写成“讪”，电视台里有个节目叫“嘎讪胡”，用的就是这个“讪”，搭讪的讪，它的词意，一个是诽谤，一个是难为情，感到羞愧，讪然。搭讪就是随意的聊天，

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六到九点钟，连续工作一星期。来到企业，穿过几道门楼，匆匆参观了生产车间，再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，还没来得及适应新鲜劲儿，即投入了紧张的“战斗”之中。

其实作为志愿者，我动完成。鼻条是口罩鼻梁上一根可以弯曲变形的塑料条，对口中呼出的雾气起阻挡作用，同样有专用的鼻条焊接机，不过相比前者稍微复杂些，需操作员将口罩片对准位置，再按动工作键，随着“嗒嗒”两声，鼻条装就被装好了。

装袋是纯手工操作。塑封也有专门的塑封机，双手轻轻一压一送，装进袋子里

的口罩就被封好，最大的不同，是不能坐下，必须站着操作。最后是装箱，将成品的口罩装进包装箱里，就可以发往最需要的地方去了。

虽然这些工序都不难，但都是流水作业，量很大，时间久了，对体力精力是个考验。就拿塑封来说，有位同事腰椎盘不好，长时间的站立使他的腰间又疼痛起来，但他只是揉了揉放松一下，继续作业。工作间里无法喝水，大家都忍着干渴，实在不行了，有位同事飞奔至外面的车里

找一个话题。

第三种写法是“嘎三壶”，“花间一壶酒”的壶，所谓“三壶”就是三壶茶。聊天时喝茶，喝了一壶又一壶，一连喝了三壶，表示聊得很投机，大家嘎得很起劲，很长的时间。

第四种写法是“嘎山河”，持这种观点的人，说是上海的“嘎三胡”和浙江人的谈山海经是同一种思路，谈山海经就是谈山和海，上海人就是谈高山大河。这种写法貌似

听郝铭鉴说“嘎三胡”

丁言昭

合理，其实也站不住脚，浙江人的山海经，名为经，其实是神话传说，是荒诞不经的，一旦写成山河，我们知道山河壮丽，“嘎山河”显得一本正经，和“嘎”的气氛是不协调的，所以写成“山河”，我觉得也没有道理。

第五种写法是“嘎三胡”，这“三胡”是指清末民初的三个人，当时上海滩上，经常传三个姓胡人的事迹。哪三胡呢？红顶商人胡雪岩、海上画家胡公寿、上海滩上名妓胡宝玉。

大家知道胡雪岩是个很会做生意，

聚起的一种大爱。红色是希望，是火焰，是热血，乍暖还寒的日子即将过去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春天的步伐。

3 个小时，我们完成了 1 万多只口罩的加工作量，3 天下来，数量攀升到 4 万多只，预计整个一周，我们可以完成 10 万只口罩。可能我仍将持续下去，我愿意继续这份工作，做那无数逆行者的中小“一朵红”，守得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。

意，有很多传奇故事，现在到杭州去的人，也都会到他的故居去看一看，几乎每天都有街谈巷议谈到胡雪岩。

胡公寿同样如此，是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，他的画卖很高的价钱，对画坛很有影响，所以当时上海滩上也经常会议论这个画家。

胡宝玉是妓女，据说是小刀会起义首领的女儿，小刀会失败后，沦落风尘，这个人很有文化修养，精通外语，英语说得非常好，能够和外国人打交道。而且时尚潮流掌握得得心应手，是一个得风气之先者。胡宝玉每天梳什么发型，穿什么衣服，用什么化妆品，拿什么装饰，包括背什么包，都会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的话题，特别是那些女性。

有人说，“嘎三胡”，就是谈这三个姓胡的人：胡雪岩、胡公寿和胡宝玉。当时有一本刊物，就曾经提到，说是这三胡，是上海人茶余饭后谈资，逐渐形成“嘎三胡”这样一种说法。这个说法不仅具有地方色彩，还具有文化内涵。

“嘎三胡”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写法。到底是哪一种，还需要进一步考证。

